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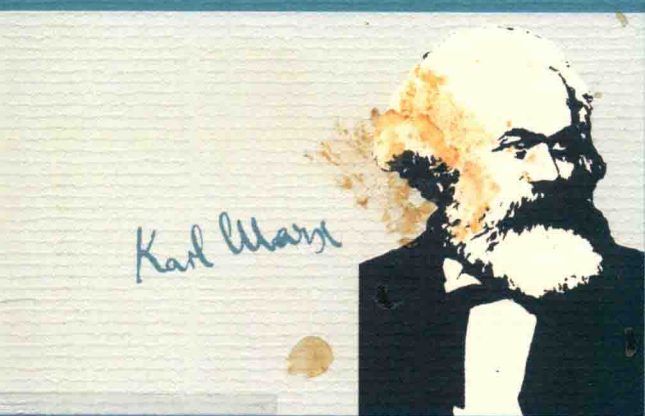


M

马克思主义 文化理论发展史

◎陆 扬 等 著

下



THE MAKING OF
MARXIST CULTURAL THEORIES

非
外
借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M

马克思主义 文化理论发展史

①

◎陆扬等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第五编 文化研究的轨迹



文化这个概念可以大得没有边际，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里，凡不属于自然的东西，可以说都属于文化。由此我们的一切知识探索，一定程度上也都可以说是“文化研究”。这个大得无边无际的“文化研究”，不是本书讨论的对象。我们这里讨论的“文化研究”，主要是伯明翰中心的传统。它强调文化的意义不光来自社会经验，同样来自社会的个体成员，即是说，每一个人正是通过社会身份的结构，得以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社会中确立自己的位置和社会关系的。这样一种文化研究和以往传统文化的研究（study of culture），显而易见有所不同。它的发端和发展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成立。

文化研究的兴起与英国新左派运动直接关联。新左派是20世纪60至70年代波及欧美各国知识界的新马克思主义运动，总体上倡导更为广泛的社会改革，劳工运动和阶级斗争不复成为关注焦点，而将同性恋权利、性别歧视、堕胎和毒品等新的社会问题，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56年2月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谴责斯大林在英国引起轩然大波。同年10月—11月，匈牙利“十月事件”爆发，苏联出兵干预，导致将近

三分之一的英国共产党员退党。有些共产党员加入了各种托洛茨基团体，有些加入工党。英国新左派运动正是在此一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它见证了早期相关刊物的出现，《新明理者》（*New Reasoner*）和《大学与左派评论》（*Universities and New Left Review*）这两家英国新左派的标志性刊物，1959年合并为《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斯图亚特·霍尔担任杂志第一任主编。1961年霍尔辞去主编，佩里·安德森接手《新左派评论》。在他的主持下，该刊成为英国新左派运动的大本营，法兰克福学派、葛兰西霸权理论、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等各路新马克思主义思想，都是通过这个窗口传布到了英国。霍尔后来说过，假如没有这一时期欧洲理论的大量翻译介绍，不可能有伯明翰中心文化研究的诞生，即便它诞生，也撑不过70年代。

1956年到1964年为英国新左派的理论盛产期，理查·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以及E. 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四部文化研究的经典著作，都诞生于这一时期。另一方面，以霍加特、威廉斯、E.P.汤普森和霍尔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的第一代传人，都有从事成人教育的相关经历。战后英国很多大学纷纷设立EMS（Department of Extra-Mural Studies），即成人教育部。霍加特、威廉斯、霍尔、汤普森都曾担任过成人教育部的教师，为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学生授课。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是1964年正式成立的，它可视为同文学研究分道扬镳结出的果实。中心第一任主任是伯明翰大学英文系教授理查·霍加特。两年之前，霍加特荣膺伯明翰大学历史上第二个英国文学教授职位，然后自己筹措经费，最终同英文系的高雅文化分庭抗礼，成立了这个专门招收成人教育研究生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1964年中心成立之际，不过主任霍加特、“义务”助理斯图亚特·霍尔以及一位秘书，一共三人。中心是从成人教育起步的，最初是清一色的研究生教学。

文化既然被解释为日常生活的全部方式，生产与消费在伯明翰中心看来，便不再是势不两立的两个极端。这和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描述的生产和消费关

系判然不同。在文化工业理论看来，一方面是主导意识形态联手寡头资本，炮制愚弄民众的大众文化；一方面是深陷圈套不能自拔、有似乌合之众的无知受众。而在伯明翰中心充分认可大众文化正面价值的视野中，文化生产最终被看作生产方式之一，这样就把文化从上层建筑拉回到基础中来，与社会经济生产和结构有了直接的联系。而注重消费研究，则将英国的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一并纳入研究对象，这样不光是资本主义，主要以跨国公司和媒体带动的后资本主义消费和剥削模式，也一样进入了细致分析和批判的文化研究视野。对于生产和消费的这一新的理解，很显然是秉承了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传统，这也可以说明何以伯明翰中心成立之初，便致力于消除英国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隔膜，将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列为文化研究的首选。

第十七章 文化研究的缘起

文化研究所具有鲜明的政治内涵和大学背景。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的初衷之一，是为亚文化族群，特别是工人阶级文化和青年亚文化族群作出辩护，它的研究对象是阶级、文化和传播学，政治上属于新左派。20世纪60年代后期风起云涌的社会和政治运动，给中心提供了大量的批判资源。但文化研究并不是一开始就作为一门学科出现的，依照斯图亚特·霍尔的说法，它深深植根于英国的新左派政治之中。霍尔甚至把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视为新左派政治在大学体制里寻到的一个避难所，使新左派政治得以改头换面薪火相传。用斯图亚特·霍尔的说法，中心是他们这些马克思主义活动家，在资本主义的“光天化日世界里对话难以为继之后”，退避学院搭建起来的一个避风港。霍尔后来在他题为《文化研究的兴起和人文学科的危机》一文中回忆说：

我们因此是来自一个远离英国学术中心的传统，我们对文化变革问题



的研究，诸如怎样理解它们，怎样描述它们，怎样从理论上来说明它们，以及它们产生怎样的社会影响和结果，最初都是在肮脏的外部世界里得到认可的。文化研究中心是光天化日之下对话难以为继之后，我们退隐其中的一方土地，它是其他手段的政治。^①

文化研究的开创性人物威廉斯、霍加特和汤普森，以及霍尔本人，都有浓重的马克思主义背景，最初都是在成人教育的工人阶级校外生中间，点燃了文化研究的薪火。霍尔称他们当中有些人，特别是他本人，曾经打算再也不回大学，再也不去“玷污”大学的门扉。但霍尔并没有如其所言同大学分道扬镳，他最后是在开放大学的教职上退休的，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为文化研究实际工作的需要作出的妥协。究竟是或不是妥协无关紧要，关键是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内涵，仅此一例就表现得相当充分了。

一、伯明翰中心花开花落

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标志着高等教育体制内部致力于考察工人阶级和边缘群体日常生活的文化研究有了一席之地。但是文化研究鲜明的跨学科性质，也使得它本身的学科定位，迄今还是众说纷纭。中心一开始的三人小组团队编制，一直延续到霍尔出任第二任主任。当时霍尔麾下，也不过只有分别从历史系和英语系过来的两个助手。霍尔主掌CCCS的时期，是文化研究如日中天的时代。中心的工作人员大体保持在六至十人之间，研究的方式主要是在中心成员聚焦大众传媒、大众文化和亚文化等等话题提交论文，组织讨论。这些文章后来大都发表在中心自己简易印刷的内部刊物《屏幕》之上。中心的研究方法是典型的跨学科的方法。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野、来自文学的文本分析，以及来自人类学和社会学

^① Stuart Hall,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risis of the Humanities", *October*, 53 (1990), p. 12.



的民族志研究这三大主要方法论，从霍尔开始，在方法上霍加特和威廉斯的文本分析主流，逐渐转移到法国理论的影响，包括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方法、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的方法，后结构主义，特别是拉康的理论方法，以及很快流行不衰的后现代传媒理论。其他如女权主义、种族理论等，也都是中心娴熟的研究方法。

中心在斯图亚特·霍尔主持下，经历了它登峰造极的鼎盛时期，成为举世瞩目的新理论中心。霍尔和中心的学生和研究人员安吉拉·麦克洛比、保罗·威里斯、理查·约翰逊、迪克·赫布迪基等人，继承了霍加特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民族志研究兴趣。但是，70年代伯明翰中心面对的战后世界，已大不同于霍加特当年《识字的用途》中描写的50年代。这个世界见证了如火如荼的学生抗议和激进批判，还有妇女解放、同性恋解放、反种族歧视。这是《识字的用途》的世界闻所未闻的。但即便时代不同，伯明翰中心依然能感受到下层阶级文化生活中的抵制情绪，著名的例子有迪克·赫布迪基1979年的作品《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以及它给出的一系列与黑人宗教、时尚、颓废男孩、摇滚乐手、光头、朋克等等相关的问题。这一类亚文化诚如霍加特呼唤昔年的工人阶级文化，引发的是活生生的文本，便于作细致分析。但赫布迪基和伯明翰中心如今重视的是符号学的文本分析方法，将目光投向索绪尔、俄国形式主义和罗兰·巴特。赫布迪基认为这类抵制主流意识形态的亚文化，总是受到市场化商业娱乐的威胁。商业主义吸收了抵制的模式和风格，在赫布迪基看来，它终究是稀释并且摧毁了亚文化的真正反抗抵制力量。

伯明翰中心声誉如日中天之际，它当仁不让是全球范围文化研究的精神源泉。但是伯明翰中心今已不存。80年代中心与社会学系合并，改称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这在关心伯明翰中心的人看来，似乎已经是一个鼎盛期过后的衰退征兆。结果是重建了社会学也重建了文化研究的构架。伯明翰校方对新建的系有明确的要求，要求它招收本科生，它的研究方向，自然也得有所改变。同时新一代的教师充实进来，新的领域如技术、公民义务、环境科学等等，纷纷开辟出来。这是标新立异呢，还是与时俱进呢？似乎也难一言定断。但毋庸置疑的是，文化研究的领域，拓

展下来已经是今非昔比了。

2002年6月27日，伯明翰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最终在暑假期间以学科重组的名义被伯明翰大学撤销了。这意味文化研究的发源地历经合并重组，在三十四年后，终于宣告关闭。学生们一开始反应激烈，8月1日，伯明翰大学学生就关闭事件召开大会，发表声明称他们正在经历的时刻，是支配人的意志变成被支配人命运的时刻。在经济需要和高效率研究的名义下，批判性质的社会科学面临市场化的逻辑，正危机重重，因为市场逻辑视批判思想为绊脚石，恨不能将它一脚踢开。比较在中国本土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恩怨交锋，或许伯明翰中心本身的关闭，可以显示传统人文学科面临上述市场逻辑的冲击，除了与时俱进，恐怕是别无选择。

但伯明翰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系的撤销，对于文化研究本身，除了一个符号意义上的失落，应是无伤大体的。许多院别已经纷纷开设文化研究课程，所以事先没有得到通知的学生再是惊诧不解，对于学业倒也无妨，大多数课程可以继续开设下去。专业并没有取消，而是重组，这也是校方愿意强调的说法：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系是经历了重组，因为它没有通过是年的研究考评。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系教学上基本每年都是名列前茅。它所提供的课程，普遍被认为是最优秀的。该系在上一年度的教学评估中，就得了最高分24分。现在问题出在研究考评，我们不妨来看这个“研究考评”又是什么东西。

研究考评就是我们所说的科研考评。它或者可以显示科研第一的高等教育办学方针，在发达国家中，亦是被贯彻得多么无情无义。伯明翰中心的最终消失，与文化研究关注的政治权力其实关系不大，而是反映了英国高等教育机制内部的压力。这压力似乎是无所不在的，据称高等教育人工部长的迫切使命之一，就是要让英国50%的学生都可以上大学。与此同时，许多奖学金项目纷纷落马，导致学生的债务直线上升。牛津、剑桥这样的老牌名校可以理直气壮，不断拉涨学费，一些财力捉襟见肘的新校，就只有广开门路，多多吸收来自四面八方的学生。所以科研经费的竞争，说它已经关乎许多学校的生存问题也不为过。此外教工薪酬和工作条件持续



滑坡，高等教育面临的就业危机则反过来与日俱增。这一切不稳定因素，足以显示伯明翰中心的关闭有许多无奈。不说其他高校类似的系多遭此同类命运，莱斯特（Leicester）大学关闭了它享有盛誉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心，一样叫人颇费猜测。这一股流行一时的关闭之风，被认为是标记了英国尝试高校重组的一个开端。重组的目标是提高财务状况良好的研究机构的竞争力，将之推向全球市场，同时使政府对高校事务的参与，可以惠及每一个国民。

但即便如此，关闭事件还是显得突兀。因为伯明翰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前不久还在政府的教学评估中得了最高分数。社会学的教学计划也经历了评估，从政府公布的数字来看，被认为是在全国范围内提供了最好的本科生教学。照市场逻辑来看，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率不断提高，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慕名纷至沓来，显然都是成功的标记。那么，问题为什么出在这个“科研”上面呢？关闭伯明翰中心的主要理由，是它在政府研究性评估方面表现不佳。评估本身是多有争议的，以至于有人说，由于一些系所擅长此道，导致评估优秀的单元数量急遽膨胀。此外同行评估，更是成为争议的焦点。评估小组逐系审读每一个教工的成果，根据业绩来分派预算。在这里，教学优秀是不起作用的。伯明翰中心校方的要求，是各系的考评不得低于4分，这是通行全国的优秀基准。而2001年的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系，恰恰是在这个基准之下，分数是3a。因此，不乏有人将中心的关闭归结为同道的妒忌。

伯明翰中心的撤除，可以说是它全盛时期突然遭此厄运，是不是意味着文化研究的气数已经耗尽？答案是否定的。在许多人看来，它更像是文化研究另起炉灶的一个新的开端。中心的薪火相传已经完成，仅就伯明翰大学来看，今日许多其他系所的专业和教师，也在潜心从事CCCS传统的文化研究。而随着此前霍尔等人移师开放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等等，文化研究早已经在全英国范围内扎根开花。而且，它的重镇总是在成人教育和传统工业城市区域，总而言之，文化研究我们喜欢它也好，不喜欢它也好，它委实是已经无所不在了。其全球范围内的流行不衰标志着学术热点和专业的重组。这个重组已经不需要伯明翰中心的神话，中心完成了它的历

史使命。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伯明翰中心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它对于文化研究的发展前景，又意味着什么呢？

理查·约翰逊后来接替霍尔担任伯明翰中心主任，鼓励社会和历史研究。当时中心的成员有莫林·麦克内尔、迈克尔·格林和安·格雷，三人均擅长文化理论和传媒研究。迈克尔·格林后来在以“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题的文章中，就伯明翰中心的早期研究成果，归纳过以下四个主题：

其一，强烈、复杂且持之以恒的文化差异。如E. P. 汤普森论早期工人阶级是怎样自觉形成的；霍加特谈英国北方坚韧的工人阶级文化；威廉斯则着眼于劳工运动，讲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成就。这里面话题都是工人阶级，但是文化各各不同。此种差异，甚至见于形形色色的青年亚文化的研究，而青年亚文化普遍被认为是阶级或“父母”文化内部压力释放的集中宣泄路径。

其二，倡导文化是“普通平常的”，强调文化是从日常生活之中发现和汲取意义。这和战后英国的政治形势是背道而驰的。比如劳工党的英国“人民”节被吸引眼球的加冕礼取而代之，约翰·里斯麾下的BBC热衷走教育路线，轻视平民娱乐，以及40年代和50年代的英国出版界，也普遍抵制异端。

其三，强调形形色色的教育和传播新形式，从根本上说都是不民主的。例如威廉斯《漫长的革命》中，就提出要进行第三次革命，将能动积极的求知过程，普及到所有民众，而不是局限在少数人集团。当年霍加特批评过英国独立电视台，威廉斯也对当代影像传播中的商业主义表示反感，呼吁关注民主的表征形式，促进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模式。

其四，有关英国和“体面”的辩论。不仅否定大英帝国主义，同样不愿意效法颐指气使的美国商业文化，抑或悄然无言的瑞典式社会民主模态。反之有意预示一个充分重视地方乡土色彩的英国文化，甚至威尔士文化。^①我们可以注意到，威尔

^① Michael Green, "Th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John Storey ed.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 Reader*, London: Arnold, 1996, p. 51.



士正是威廉斯的家乡。

从以上归纳的伯明翰中心文化研究的四个主题，可以看出英国新左派注目的政治生活的特点，即强调文化是社会生活中共享的意义生产和流通。中心不但关注工人阶级文化，对于日常生活和本土文化，也都给予了充分重视。反之把大众传媒的语言和形象，看作特定阶级和集团假公济私的虚假表征。换言之，它们所表现的，并非“共享”的价值观念。所以这样来看，大众传媒一方面是主导意识形态的宣传阵地，一方面也是受众自觉不自觉的抵制场地。文化研究就在这一动态的抵制和协调过程中，书写着资本主义既定秩序的颠覆努力。

无疑，伯明翰中心的文化研究挑战了“二战”之后英国的主流文化。文化曾经是文学和艺术的一统天下，无论是文本还是行为思想，文化分析几乎是清一色的美学的标准。反之大众文化体现的就是商业趣味、低劣趣味，或者说纯粹就是没有趣味，是审美趣味的堕落。但是现在，趣味的天经地义的高雅和风雅，在文化研究的挑战之下，已经将变得摇摇欲坠了。文化研究虽然走的是外围路线，但是很显然，它已经在高等教育的体制中站稳了脚跟。或许今天它还是一门准学科、新兴学科，但是相信不用太久，它会像我们的其他传统学科一样，在不同的专业里牢固地确立它的地位。

二、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质

文化研究的历史不长，但是它在表现为研究方法和策略的同时，很显然已经形成了一门相对独立的新兴科学。但诚如文化研究作为研究方法千头万绪，各成体系，文化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怎样从哲学、社会学、文学这些传统学科中脱胎而出，以及它如何依然难分难解地呈现着鲜明的跨科学态势，也必须交代清楚。斯图亚特·霍尔后来这样回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时的“窘境”：

中心成立之日，我们收到了各家英文系的来信，说他们做不到真心诚意

欢迎我们；他们知道我们在这里，但是希望他们不得不一如既往，做他们本分工作的时候，我们不要挡路。我们还收到了另一封来自社会学系的信，更要尖锐得多，事实上它说：“……我们希望你们别以为自己在做社会学，因为社会学压根就不是你们在做的事情。”^①

霍尔的话可以显示文化研究是怎样从文学的母体之中脱胎而出，而走向不被正统社会学认可的社会学研究。即便是与它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个传统学科文学和社会学，当时对它的抵制态度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毋庸置疑，伯明翰中心以边缘向中心进军，以日常文化向高雅文学发难的解构主义策略，取得了始料不及的巨大成功。或者说，霍加特在有意无意之间，开创了一个新的学科，至少，一个方兴未艾、正在向许多传统学科发起挑战的“准学科”。

我们可以首先来看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文化研究如上所见，学科体制上它是英文系的产物，与文学关系密切，从中汲取了文本分析的主要方法，虽然最终是和文学分道扬镳了。从一定程度上讲，诚如批评家所言，它是从“左派利维斯主义”起步的。F. R. 利维斯主编的《细绎》杂志提倡文本细读，后来也成为文化研究将大众文化现象当作文本分析的看家方法。此外，文化研究与社会学也关系密切，从社会学中它借鉴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关心特定文化群和亚文化群的意义建构，专心考察边缘群体的生活方式。不但如此，文化研究同历史学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研究也研究历史，不过这是广义上的下层阶级的历史，此外它还侧重口传历史、大众记忆。这一切同英雄政要的正统史学，固不相同。

早在伯明翰中心成立之前，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1957）、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958）和《漫长的革命》（1961），就是文化研究三部典型的先驱著作。前者是工人阶级通过阅读自己的文本，来表达对资产阶级主导意识形态

^① Stuart Hall,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risis of the Humanities”, *October*, 53, 1990, p. 13.



的反抗。这里的“文本”远不限于文学，而是从邻里文化、生活习俗到报纸杂志的形形色色的“工人阶级自己的声音”。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如前所见，表达了与利维斯主义的分歧。他的《漫长的革命》，则将《细绎》杂志所关注的艺术、教育、政治和交流等等诸多话题，置于乐观主义的未来框架中来加以叙述，一反利维斯对当代大众文化忧心忡忡的不屑一顾态度。这一切，都是与利维斯主义定位在英国文学伟大传统上面的高雅文化针锋相对的。诚如霍加特所言：

因此，我是选取了非常单一的工人阶级群体，通过描述他们的居住环境和人生态度，尝试再现他们的生活氛围和质量。在这一背景中，我们可以看到，大众出版物五花八门，其无边弥漫的感染力，如何连接着广被接受的人生态度，以及它们如何改变这些态度，又如何遭遇抵抗。^①

这可见，霍加特充分肯定了大众传媒的政治内涵，不是把它们看作利维斯主义视野中的乌合之众娱乐产品，而是强调它们与不同阶级和集团的连接关系，以及抵抗意识在其中的展示。这是鲜明的新左派的立场。加上对日常生活经验的重视，这一切都预演了以后文化研究的基本方向。

在《文化与社会》中，雷蒙·威廉斯直接质疑了利维斯传统的文学至上主义。他指出，利维斯的文化观点主要来源于马修·阿诺德，而阿诺德的观点又可上溯到柯勒律治。但在柯勒律治看来，“少数人”是一个阶级，即受国家资助的知识阶级，其使命是普及一切学科的知识，而到利维斯，“少数人”本质上就成了文学上的少数派，其使命相应成为保持文学传统和最优秀的语言能力。但威廉斯最终鲜明地表明了他的观点：由利维斯奠立基础的以文学为中心的英语教育，固然是所有教育中的一个中心，但是英语教育并不等于整个教育。同理，无论正规教育多么高

^①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57, p. 19.

尚，也不是过去和现在社会经验的全部。

但是学术范式变迁不断，很大程度上犹如时尚流转。新近时尚，是文学重归审美。从再现、表现、模仿、典型乃至审美这些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风行术语来看，基本上是西方话语的一统天下，以至于时而有学者愤愤不平，认为中国古典文论患了“失语症”。同理，此一新近流行的重归审美的时尚，也有相应的西方理论后援。其中一马当先的，就是2004年姗姗来迟的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中译本的面世。该书中译本序言中，作者这样描述当今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纠葛：

在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被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西方经典已被各种诸如此类的十字军运动所代替，如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族裔研究，以及关于各种性倾向的奇谈怪论。^①

布鲁姆自称他的英雄偶像是以标举古典主义趣味著称的19世纪英国批评家塞缪尔·约翰逊。可是又说，即便是约翰逊，在如今大学的道德王国里，也难以找到一席之地。很显然这还是“政治正确”的老话：文化研究在他看来涉及各种各样的价值判断，偏偏就是没有关于审美的价值判断。所以文学批评的当务之急，便是重归审美。《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的英文初版是在1994年，那正是文化研究如火如荼的鼎盛时期，无怪乎作者开篇就说，我们的每一所高校中都将设立文化研究系，这趋势就好比一头公牛不可拂逆。但是面对这一仿佛势不可当、将一应后现代理论悉尽收入罟中的“文化研究大潮”，布鲁姆有心力挽狂澜，重申文学的

^①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中文版序言第2页。



尊严，所以再一次树起了仿佛已成明日黄花的审美大旗。

有意思的是，究竟是文化研究异军突起导致文学研究危机深重，还是文学研究眼见文化研究从自己的母体中脱胎而出，有心扼杀这个新生儿，看法还见仁见智，不尽相同。2008年访问过中国的英国传播学者科林·斯巴克斯在其《文化研究的演进》一文中，就认为文学研究的危机，并非通常如人所言，全然是因为目光只盯住经典作家、经典作品，从而排斥了大众文化的研究。即便是马修·阿诺德、T. S. 艾略特和F. R. 利维斯这些作家，说他们一味鼓吹精英主义路线，在斯巴克斯看来他们也是多少受了冤枉，虽然这一指责对于他们的追随者们来说，或许倒是所言不虚。理由是这三人都对文化非常关切，特别是高雅艺术与文学同社会体制的关系。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固不待言，T. S. 艾略特的《文化定义笔记》亦然。利维斯对文学抱有过高期望，也算是对民间文化情有独钟，而民间文化同样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是社会生活的真正艺术。所以，言及危机的真正原因，斯巴克斯将之定位在政治上。换言之，传统的文学研究和新近的文化研究之间，矛盾终究是在于反民主和要民主之间。斯巴克斯这样描述文学研究对于文化研究的畏惧：

文化研究整个儿接过了文学批评的方案，却高举民粹主义，同父亲划清界限，由此来界定自身。故此它是将自己发落到边缘地带，其方式与社会学还有不同——它有意填补的知识空间已经被它充满敌意的父亲占领在先，后者自有种种制度上的强烈动机，将这个新生儿扼杀在襁褓之中。^①

这可见，文学研究不满文化研究的半路杀出，抢了它的饭碗，文化研究还觉得自己在受压迫呢。无论如何，文学研究应当有充分的理由同文化研究和平共处。就文化研究是以当代工业或者说后工业社会生活方式为其考究对象而言，仿佛是形同

^① Colin Sparks, "The Evolution of Cultural Studies", John Storey ed.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 Reader*, London: Arnold, 1996, p. 15.

陌路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和伯明翰的传统一样，正不妨视为文化研究相辅相成的双翼。伯明翰学派固不必对法兰克福学派走精英主义贵族路线耿耿于怀，反过来法兰克福学派也无须质疑伯明翰学派浪漫化了工人阶级文化。

其次来看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的关系。这一关系可以追溯到传统社会学的文化理论。此一理论的基本前提是生活方式，包括支撑各种社会关系的价值观念和信仰模式，必受到社会关系模式的限制——不论是平等的，抑或等级制的社会关系模式。故而社会学的文化理论，其目的便是去解释这些模式及其形构过程。这里面自然与日常生活有着密切联系，因为正是在社会生活之中，人们学会如何与他人交往，以及期望别人如何与自己交往。比较社会学的一般理论侧重考究个人和集团如何通过政府和市场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社会学的文化理论则着重解释为什么人们想要这些东西，这里面就涉及意义和符号的表征了。

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事实上许多文化研究学者本身就是社会学家，许多社会学家也同样在从事文化研究。但是差别毕竟存在，社会学作为“社会”的话语，必然有它的特定语境或者说本土性。就伯明翰传统的文化研究来看，我们发现它对于社会学，特别是美国的社会学传统，是多有言所不及的。一般来说，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些学科分野比较模糊的国家，文化研究和社会学融合得较好。而像美国这样学科分类明晰的国家，文化研究又大都在人文学科里安营扎寨，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的关系，就比较能见出分歧来。

美国的文化研究主要是在高等教育体制内部发生发展，这一点不同于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传统发端于成人教育。英国的成人教育和开放大学传统自有它的渊源，这个渊源其他国家未必一样具备。就此而言，中国的成人教育一定程度上与美国相仿，迄今不成大的气候；中国的文化研究也同美国相似，迄今主要还是在高校机制里展开。但即便是在美国，文化研究在高校里也大都作为跨学科课程教授，或者成立研究中心进行研究。这和社会学稳固的学科地位尚不可同日而语。

社会学一向关注文化。文化是社会变革的动因，它可以解释传统的回归，也



可以解释社会生活新形式的出现。文化使社会学的研究见出深度，尤其面对社会差异，它有助于以多元视野来替补一元理性分析。这样来看，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和商品拜物教的分析、韦伯对传统价值与新教伦理的比较，以及涂尔干对“失范”和集体表征的研究，都可视为早期社会思想家对社会文化内涵的关注。但是，假如把文化看作一个符号系统，那么很显然文化分析理所应当有它自己的领域。比较来看，社会学的传统重心则是在科学。早在19世纪，作为社会学原型的人口统计学，其奉行的对社会给定事实的量化分析方法，就是典型的科学主义传统。而正是在这一背靠科学的氛围中，社会学确立了它的学科地位。在传统社会学中，文化隶属于社会制度、社会过程、社会集团及其社会实践。个别的文化产品，比较它们的社会生成和接受语境，其本身的意义和形式是无足轻重的。

20世纪60年代之后文化社会学开始兴起，社会学历经了一个“文化转向”。文化转向意味什么？首先，它意味承认大众文化特别是消费文化，与高雅文化一样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它意味社会学的几乎每一个研究领域，无论是性别、种族、科学和国家研究，必须与文化携手，方有可能建立其学科地位。最后，它意味社会学的学科边界将是开放性的，特别是文化研究的成果，将被大量吸收进来。这样来看，文化社会学兼收并蓄，将大众文化、高雅文化特别是文化产品，包括它们的价值及其接受过程，以及知识社会学、文化资本、政治文化等等尽收罗中。

但是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的差异，也是明显的。美国社会学家斯蒂芬·塞德曼在他题为《相对的社会学：文化研究的挑战》的文章中，提出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的差异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符号学转向的问题。社会学力求对社会作系统分析，其方法与文化研究的多元视野比较，相对显得单纯。社会学家大都雄心勃勃，意在全面理解社会，给社会提供全面整体的系统分析，这与经济学、政治学，甚或哲学和宗教等其他领域术业有专攻的特点，都有不同。文化研究在这一方面对社会学提出的挑战，表明它同样有意识地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作出系统分析，但是不同于社会学采用的统计学的理性分析方法，文化研究则显示了文本分析，或者更确